



新贫困视域下乡村转型的困厄与重构路径

郑红娥 童星

[摘要] 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背景之一是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这使得新穷人现象日渐凸显,并成为影响甚至主导整个社会转型的核心线索。作为新穷人的典型表现,乡村新贫困既包括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村民难以获得以城市生活方式为参照的社会公认生活水准而引发的结构性贫困,也包括由消费欲望激发的社会心理性贫困。由此,乡村消费转型表现为如下困境:私人消费中,个体消费认同在地和脱嵌的困境以及家庭消费规范物质化和人伦的两难;集体消费中,消费品“上移”和“下乡”的悖论。为应对这些困境,必须从消费角度,破解“新穷困”的结构性和文化困境,实行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和并举。

[关键词] 消费转型;新穷困;新穷人;集体消费;私人消费

DOI:10.13240/j.cnki.caujsse.20180524.002

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背景之一便是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尽管对中国是否进入消费社会这一议题存有争议,但无可置疑的是,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诸多消费问题甚至发展问题的探讨都基于消费社会这一背景,运用消费社会理论框架,围绕消费社会带来的富足愿景而展开,如:究竟何为富足,仅仅指物质层面的富足吗?能让每个社会成员过上富足的生活吗?在这种反思与拷问中,消费社会中的新穷人现象及其应对成为广泛关注的话题。围绕这个话题,国内外学者展开了诸多探讨,如鲍曼、戴(Phyllis Day)、凯菲茨(Nathan Keyfitz)等对发达国家的新穷人展开了论述^[1-3],顾汝德(Leo Goodstadt)探讨了香港的新穷人现象^[4],汪晖剖析了中国大陆城市的两种新穷人的尊严政治等^[5]。国内特有的新穷人现象究竟怎样,与发达国家的新穷人相比,有何异同,以及如何应对等,本文尝试对此展开论述。

一、何为新穷人

(一) 消费视域下新贫困的出现

综观国内外学者有关消费的探讨,无外乎两种视域或研究途径,即生产主导和消费主导视域。生产主导视域认为生产决定或者形成消费本身,又由此直接形成特殊的消费文化结构。这种视角始于马克思区分的两种生产:一种直接为自己所用而占用,另一种专为市场交换创建,即作为商品生产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不仅遮掩了,而且代表或代替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使生产和消费的结合破裂,人们对自己及他人的看法被商品崇拜歪曲,即商品拜物教的产生。基于马克思的批判,学者们进一步认为逐利的需求导致产品无限制扩大的生产,只有加强对消费者的控制和操纵,才能销售出去。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对此展开深刻批判。如阿多诺认为商品通过文化联想和幻想,使其忘却了最初的使用价值,获得间接的或代替的使用价值^[6]。这便为商品译成消费者无法抗拒的符号代码提供了契机。生产导向的第二种视角认为消费需求的增长不仅与市场活动和交换价值的影响有关,而且还与国家分配有关。如卡斯特利斯(Castells)分析了集体消费历史,指出集体消费是指消费过程就其性质和规模来说,其组织和管理只能是集体供给,如住房、社会公共设施、医疗和教育等,并认为集体消费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主要消费内容^[7]。围绕集体消费的提供,城市社

[收稿日期] 2017-12-23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消费社会理论研究”(项目号为15BSH010)的支持。

[作者简介] 郑红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邮编:100083;
童星,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会运动,即城市劳动阶级围绕城市集体消费供给的“缩水”展开的斗争或抗议由此产生。这种视角引发的问题是:是什么给予消费者能获得满足需求和快乐的权利(特别是在作为过剩生产者的情形下)。基于此,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不同群体是否有获得不同的服务和商品的机会,再追问下去,不同分配方式,即由市场还是由政府提供,会导致不同人群间的社会差异吗?当然,桑德斯(Saunders)探讨了由私人服务和政府所派生的不同的社会优势^[8]。第三种视角着重从生产和消费的循环角度探讨循环内部的权利关系,认为商品、服务或经验被最终享用之前,经历了不同的生产和消费间的循环。

与生产主导视域相反,消费主导视域认为消费不是被动性的,消费本身是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第一种视角认为消费者将商品当作社会地位和文化方式的标识,以此与其他消费者区分的同时开展社会地位竞争,如凡勃仑对有闲阶层的探讨^[9]。第二种视角注重编码逻辑的解释路径。如鲍德里亚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从以商品形式为主的阶段进入到以符号形式为主的阶段,生产的逻辑不再至关重要,反之,意义的逻辑成为最重要的^[10]。第三种视角从浪漫主义伦理出发,消费既不被看作为对生产的自动反应,也不是对意义的自动反应,而是被看成来自消费者自身这一独立源泉。如坎贝尔(Colin Campbell)认为始于18世纪晚期的现代享乐主义用想象代替真正的刺激,不再具有确切的指向和关注的焦点,而是渴望在现实中经历那些在臆想中创造或享受的快乐^[11]。

生产主导视域和消费主导视域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在笔者看来,生产主导视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消费主导视域,但消费主导视域具有自主性,又能反作用于生产导向视域。具体说来,特有的生产体制和资源分配机制决定了群体的消费资源的获得,导致了围绕消费展开的消费区分、地位竞争以及对消费符码的不同解读禀赋,但消费的自主性使得商品的意义逻辑脱离其生产逻辑独行其是,而消费者受欲望的支配下,能脱离自身社会地位的限制,经历臆想中的消费快乐。由此,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者权利的确保与维护成为时代关注的话题,正如卡斯特利斯所言集体消费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社会运动的核心,对这一话题的应对并不导致对经济领域不公平话题的消解,反而更凸显了经济体制和分配体制的不公和残酷,如下述鲍曼的论述。由于篇幅的有限,本文着重从消费主导视角出发,围绕欲望生成逻辑论述乡村在迎接消费社会到来的挑战中出现的问题、困境以及可能的出路。

不像其它探讨贫困的大家将贫困归结为贫困者自身资源和能力的缺乏,鲍曼将贫困归结为社会制度或体制所造就。“每个社会都根据其特定的秩序及规范模式,以其自身的形象建构了穷人,并为其存在提供不同解释,发现不同的穷人用途,并发展出对付贫穷问题的不同策略”^{[11]119-120}。在基督教传统中,穷人是血肉、需要帮助的具体存在。在生产社会阶段,蓬勃发展的工业生产急需劳动力,穷人代表着劳动力和源源不断的财富;国家通过工作伦理将原本从事自由劳作的穷人规训成服从工厂严格纪律的劳工,并使任何工作成为道德尊严的一部分;正是帮助穷人的道德正义,促进与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建立。在消费社会中,为追求对全球廉价劳动力的利用,国际资本的跨国流动使得发达国家不再需要穷人,穷人不再是劳动力的储备军;帮助穷人丧失了经济利益,穷人不再是宗教意义上的救赎对象,也不再充当稳定的劳动后备军,穷人不仅被逐出道德领域,而且被社会抛弃,成为不必要的存在,于是福利制度改变导致集体消费的大规模缩水。

鲍曼从宏观视角揭示了资本逐利的本性导致西方式消费社会残酷的运作机制,强调了新贫困产生的社会文化机制和新穷人无法过所谓高尚消费生活的剥夺感、排斥感,因而深化了新贫困的社会排斥、剥夺机制以及悖论性存在^①。顾汝德则探讨了香港富裕社会背景下的新贫困阶层。他认

① 从社会方面来说,一方面社会需要穷人扮演消费者角色,以此履行爱国责任,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受资本逐利的影响,社会不需要他们,将他们逐出道德和福利领域,使之成为不必要的存在。从穷人个体方面来说,受广告媒体和主流价值观影响,穷人被激发去拥有高尚、时宜的生活水准;但现实中穷人一无所有,丧失任何机会。

为香港的贫穷问题既不是经济危机的产物,也不是个人不努力、不勤奋,而是港英当局和特区政府一系列政策失误以及迎合商界利益的畸形发展导向、不愿承担社会福利导致的恶果。他将新贫困定义为不仅仅缺钱,还包括因无法得到应有的社会支持、社会尊重而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压迫^{[4]21}。尽管两人的侧重点不同,但是都一致认为穷人被逐出了道德和福利领域,无法得到应有的社会支持和社会尊重,在消费欲望面前,更感到社会心理上的贫困。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新贫困的制造机制如下:首先,消费社会的到来意味着过剩经济时代的来临,不仅产能极大过剩,而且人员冗余,失业、过剩成为社会发展的常态。资本的全球流动以及机器对人工的取代使得穷人不再是劳动市场的雇佣军,不再具有创造财富的可能,自然便逐出道德和社会福利的领域。正如凯菲茨所言,在19世纪,穷人对于整个工业生产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在工厂中劳作,成为推动工业革命向前发展的动力,因而被视为人类(a human aspect)看待。到了消费社会,工人不再是工业生产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随着自动化的进程,中产阶级越来越不需要穷人。“这产生了社会的分裂,比19世纪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宣称的两个国家更为激进和剧烈”^{[3]44}。

其次,发展主义的发展本质引发财富和消费资料分配的“极化”效应。“发展政策的每个方面有着它的再分配效应。对法律学校的赞助属于一种先进的行为,对自行车修理的培训被认为是落后的。估值过高的货币被视为是先进的,不动产税收则被认为是落后的。对穷人的慷慨的赠与被视为落后的支持,且影响是暂时的,只适合于紧急状态。……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角度看,对被认为落后的方面实施支持是困难的。只要穷人被认为勉强属于人类(barely human),是对中产阶级社区的耻辱,那么对这些边缘群体进行支持无疑受到权威人士的抵制。只要被归属为落后的支持,穷人将不断被建构为贫困的,并不断被边缘化,被视为不需要,甚至是无用的。也正是穷人被勉强视为人类,他们很难成为获得慈善的主体,更不用说获得持久的帮助^{[3]47}。”正因为穷人不再具有创造任何社会财富的价值,被落入社会发展级中与先进相对的落后的一级,不论在财富还是消费资料的分配上均成为国家极力规避的对象,如高福利国家的转型和集体消费供给上的缩水。由此,作为内生于发展,有悖于社会进化论预设的新贫困的建构,对于穷人来说无疑釜底抽薪,不仅贫困的无可救赎,而且被斥为“不够人类”,沦为“被废弃的生命”^[12],更随时遭遇以有逆于社会秩序之名的驱逐、关押,甚至杀戮。是否以及如何将穷人重新纳入生产、消费和贸易的循环中无疑成为每个国家回应新时代公平的诘问,审视发展路径无可规避的重要议题。

(二) 被推高的消费欲望

在新贫困的“制造”上,不论是过剩经济时代的资本“推手”,还是发展逻辑的内在排斥,都是基于欲望激发机制得以运作。个体心理层面的欲望满足是有限的,而基于社会心理层面的欲望激发则是无穷无尽的。基于社会心理维度,每个时代都会开列体现欲望层次等级的地位物品清单^①,到了过剩经济时代的消费社会,这种欲望激发机制更得以高速运行,不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将欲望的生发、示差、趋同、排斥推向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使得整个社会成为“互为一体的跑步机,即生产和消费跑步机互相推动”^{[13]88}。

作为消费社会的运作机制,欲望无疑在新穷人的“制造”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鲍德里亚指出,在消费社会中,消费不仅仅被认为是以需要为基础,也逐渐建立在欲望之上^{[14]10-56}。从列维斯特劳斯强调符号和象征在“前书写社会”的神话与仪式结构中扮演角色的分析^[15],到巴特运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模型对法国大众文化进行记号学分析^[16],再到后结构主义者布迪厄和鲍德里亚各自对消费区隔和消费社会的研究等,都使得符号和象征在现代消

① 赫什将这种难以获取的事物称为“地位物品”,对它们的客观需要,至少部分取决于供给不足、获取受限、高价格,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名誉或地位。参见 Hirsch Fred: *Social Limit to Growth*. London: Routledge, 1977。

费中的重要性日渐彰显^[10,17]。这尤其表现为各种促销商品的广告,“在20世纪后半的西方资本主义中,消费可以说是一种涉及到文化符号与象征的社会、文化过程,而不仅是一种经济的、实用的过程。……无论是在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或是在那些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形态中,许多人的消费模式都是取决于他们的经济条件,而非此处所论及的社会与文化因素。然而,人们一旦被所谓的现代消费主义相关的社会与文化行动所影响,则就算他们买不起影片、报纸和电视上所呈现的那些物品,他们还是可以并且确实欲望它们”^{[18]11}。在生产社会中,消费跟个体的经济收入和职业(即固定的身份)有关;到了消费社会,即便经济收入达不到,个体也想得到社会公认的生活水准,即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斯格尔(Juliet Schor)在《过度花费的美国人》一书中描述了新消费主义的兴起^[19]。过去,美国人以具有相似消费标准的邻居作为攀比的对象;今天,则以那些收入远在自身之上的人或群体作为参照。广告和媒体在“拔高”消费者的参照群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电视上所宣称的往往是中上阶层、甚至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但电视观众却把它看作是普通人的生活方式,通过看电视,观众把“什么是正常的生活水平”无形中提高了。因而,花的钱多了,却感觉穷了,原因在于攀比对象的消费水准在不断上升,而攀比者总也赶不上被攀比者财富和消费水平的上升速度。

在中国也是如此。从消费水准来看,现在媒体平台上充斥的,无论是现实中真实的人生还是电视剧里的虚构,往往都是中上阶层、甚至顶级阶层的生活,乘着私家飞机,开着豪华轿车,过着奢靡的日子。无处不在的广告无不在向人们宣扬、引领着时尚、时宜的生活方式,媒体在不经意间把人们对成功和幸福的衡量标准推到极高的水平。面对精英消费者阶层的高消费,其它阶层的人们只能望而兴叹,“新穷困”的现象自然盛行。

近年来的国家统计局年鉴数据表明,广大乡村有80%~90%的日常所需必须用货币从周边乡镇上购买,对货币的追求无疑导致消费购买力的逻辑渗透到乡村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影响或左右村民行为乃至乡村秩序的主导因素。这不仅导致消费主义在乡村渗透蔓延,也引发家庭结构的改变和村庄道德共同体的解体。家庭基于利润的算计和分配进行劳动力安排,根据家庭成员的经济贡献确定个体在家庭中的权威和地位。“由于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依赖于外出务工的年轻一代,家庭中老人地位下降,青年人地位普遍上升。也就表明,决定家庭成员地位的不再是辈分和年龄,而是家庭成员对家庭经济贡献的大小”^{[20]53}。

然而,消费主义的渗透并没有给村民带来预料中的幸福和富裕,反而激发了消费社会存在的“新穷人现象”,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从而与“快乐生活”的机会绝缘^{[1]83-85}。消费社会的运作逻辑颠倒了需要及其满足之间的传统关系,满足的许诺和期望优先于需要,且总是大于既有的需要。作为不完美和有缺陷的消费者,新穷人的资源不足以符合和满足自身的欲望,无力完成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正如贺雪峰指出,“电视广告每时每刻都是传播消费主义文化,它告诉观众,有钱的生活才是体面的生活,‘我消费我存在’。但在农民收入有限的背景下,广告和时尚调动了农民的消费欲望,农民却无实现他们应该具有的现代生活所需要的就业和经济收入。他们成为有需要而无能力的无效需求,成了彻底的边缘人群”^[21]。

本文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个方面定义新贫困。从绝对贫困层面来说,新贫困定义为富裕社会下由于福利失配^①导致个体在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拥有上处于匮乏状态,通常表现为低于贫困线的贫困。如据《基督教科学报》2010年报道,由于美国的失业率达到9%(失业意味着医疗等各种福利的缺乏),曾经高于贫困线,没有达到中产阶级的这部分群体构成了新穷人的主体

① 福利失配是指福利承诺水平低于财力资源所能支撑水平的现象,指的是随着财力资源的增加,国家不但没有在福利领域延续原先的高承诺,反而放弃原先的高承诺,或压低承诺水平。参见王宁:国家福利承诺与集体消费演变的逻辑:一个托克维尔的分析框架,载《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第178-190页。

(即以一家四口年收入达到 22 000 美元作为贫困线进行计算),贫困率从 2008 年的 13.2% 上升到 2010 年的 14.3%。如果对贫困的定义不只是从收入,而是更多考虑跟富足相关的因素,如包括有能力过一种习惯的生活方式计算,美国的贫困率达到了 15%^[22]。相对贫困是指在富裕的消费社会中,无法获得社会公认的生活水准(即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水准),既包括无法或难以获得可观的收入,也包括难以享有教育、医疗等集体消费品。由于缺乏确定社会公认生活水准的统一标准,加之广告媒体在引导生活水准上发挥重要作用,新贫困还表现为因无法或难以获得时宜生活水准所引发的社会心理性贫困。与之相应,新穷人无疑为缺乏拥有社会公认生活水准的能力或资源的群体。从能力缺乏层面看,新穷人是指不具备消费购买力、有缺陷的消费者;从资源缺乏层面看,新穷人意味着在社会财富或资源分配领域均处于弱势的群体。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使得新贫困问题在乡村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 新旧穷人对比

如果说旧穷人主要是从生产者角度,将之定义为缺乏(生产)资源、能力与技巧的话,那么新穷人则主要基于消费者角度,将之定义为“不具备消费购买力的有缺陷的消费者,从而没有能力尽消费者义务”^{[1]100}。与之相应,旧贫困是指无法获得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条件,如饥饿,得不到医疗照顾,缺乏遮盖物;停留在存活的水准上以及营养不良。新贫困是指在衣食住行方面不符合当时当地界定为正确合宜的标准以及丧失生活机会,丧失选择的自由。“这 50 年,农民的福利越来越依赖于货币,大量的消费需求被制造出来,逼迫农民用货币来购买。以前是小康的生活,因为整个社会新的消费需求制造出来,而变成了温饱,以前尚属于温饱的生活,下降为贫困。这样一来,农民的福利就不仅仅是因为相对收入下降而且绝对收入(购买能力)也下降了”^[21]。

由此,新贫困既表现为结构性贫困,即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生活方式的渗透导致乡村原有的自给自足生活方式的破坏以及传统福利的丧失,使得乡村居民难以远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获得以城镇生活水平为标准制定的社会公认生活水准而引发的实质性的贫困;也包括因欲望激发而引起的无法达到时宜消费水准的文化性贫困。广告媒体传播的是以城市生活方式为参照的富裕生活,乡村的生活方式便成为落后、贫穷的代名词。加之主流学者给出的进入消费社会的良方即城市化唤起了社会愿景,现实中城市又难以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其间的落差更加剧和感性化了结构性贫困。这典型表现为农民工的两栖消费,即在城市生活中节俭,以便在乡村场域中奢侈。两栖消费是应对消费主义观念与有限支付能力之张力的家庭预算策略^{[23]313}。“在当代中国,消费主义与发展主义相辅相成地构造着中国人的生活,人们陷入了发展—消费—发展永无安息之日的追逐中。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以物质财富的占有量,以‘快乐’的消费构造出富裕/贫穷、发达/落后的对立项,然后以此来确定人的社会等级,如此一来,被刺激的对物质财富的渴求,对消费的欲望就永远像那个吊在驴子之前的胡萝卜,永远有人比你更前进一步,更富有,更发达,你就只能像那只驴一样,拉着沉重的磨盘不停向前赶,但永远赶不上”^[24]。

这种新贫困的现象也潜在地影响甚至左右着目前扶贫标准的“与时俱进”。自 2010 年以来中国扶贫的目标和宗旨发生了很大变化,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并将扶贫的内容由确保个体的基本生存向各项福利待遇转变^[25]。

二、新穷人与乡村消费转型的困境

如上所述,新穷人现象成为分析中国乡村社会消费转型的核心线索。新穷人问题不仅是如鲍曼、顾汝德和王宁揭示的在经济权利(如可观收入、实际购买力)和社会权利(如社会保障与福利)上增权就可以解决,更需要对本土性文化价值和传统福利的重视和利用以及改变穷人自身对富足的认知。当下的乡村消费转型表现为如下的困境:在私人消费方面,个体消费认同存在着在地和脱

嵌的困境,家庭消费规范存在着物质化和人伦的两难;在集体消费提供方面,存在着“上移”和“下乡”的悖论。

(一) 个体消费认同: 在地和脱嵌的困境

“中国人的生活是靠土地,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26]12}。“这种文化与乡间和泥土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长久以来束缚和制约着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国因而是所谓的乡土中国”^[27]。村民围绕“土”建立整个消费认同,包括个体的身份、社会归属和追求的生活方式。

在消费转型中,尽管村民的消费行为或多或少仍然受到传统节俭消费观的制约,但已开始受铺天盖地的电视媒体和广告推崇的城市生活时尚影响,逐步认同、推崇城市生活方式,不认同、甚至排斥乡村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而对脱嵌的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无疑导致对在地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的解构和本能地拒斥。村民逐渐扬弃传统节俭的消费观,开始追求炫耀性、时尚性消费。时尚的动力机制是社会比较和竞争机制,即以消费品显示自身的社会地位^[28]。一波波社会地位竞争的“暗波”开始在乡村内涌动,各种耐用消费品被用作体现社会地位优势的物品,住宅成为最典型的社会地位差异标志^[29]。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为了实现对城市生活风格群体的认同,他们不愿再回到乡村,想方设法在城市购买住房,希望尽快融入城市生活。

正是由于村民认同城市生活方式,对自身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缺乏自信,并千方百计离开乡村,从而导致大量的乡村空心化,乡村原有的支持网络和传统文化遭到侵蚀和破坏,乡村原有福利正逐步丧失。“最糟糕的是,市场经济和现代传媒还将以巨大力量摧毁农民世代以来的价值观,摧毁他们以前一直以为有意义的生活和文化。……总之,农民现有的生活方式和本体价值等一切都受到怀疑并被宣布为错误,农民会接受这种关于自己生活价值是错误的结论。农民文化越来越被排挤在边缘地位”^[21]。

尽管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认同城市生活方式,但受限于捉襟见肘的收入,无法在城市实践他们的消费期望,只能通过两栖消费,在乡村“模拟”城市生活方式^①。在地和脱嵌的困境充分折射出乡村内在结构性贫困,即在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固化、难以破解的前提下,一味强调以城市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或最重要的途径,无疑在制造新的贫困,即传统福利的丧失和现代化集体消费供给的缺乏同时并存。

(二) 家庭消费规范: 物质化和人伦的两难

村民不管在满足个人或家庭的需要,还是应对和防控消费风险方面,目前主要依靠家庭来解决。家庭利他主义仍然是凝聚家庭的纽带。“高度家庭利他主义可以通过住宅消费来理解。对每个家庭成员来说,居住的地点实际上是一个集体的财产”^{[30]22}。李洪君通过其田野调查表明,在消费支出上,那些可以满足组织内所有成员共同需求的项目,能够获得家庭集体道德的支持,住房正是这样的首选项目^[31]。

随着消费主义的渗透,利他主义家庭关系开始被消费“捆绑”。常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为弥补他们在家庭和乡村中的“缺席”或“不在场”,实施面子消费、代理消费、人情消费等,消费物品起了重要的弥补、替代和建构家庭亲情的符号作用^[32-33],即以物品象征返乡民工在乡村的在场(如

① 尽管卢嘉瑞将此称为乡村消费的城市化(参见卢嘉瑞:中国农村消费城市化现象研究,载《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第23-27页),但在笔者看来,这仅仅只是形式上模仿城市生活方式。在村民眼中,耐用消费品不仅是体现社会地位的物品,更是凸显小康富裕生活的重要衡量标准。这些被当做社会地位标识的物品,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生搬硬套地模仿大战后美国 and 大部分西欧发达国家中已经普遍存在的中等阶级生活和消费模式”(参见尤卡·格罗瑙《趣味社会学》,向建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在乡村推行这种中等阶级生活和消费模式的同时,却忽略与这种消费模式相配套的经济基础、基础设施和制度设置。而且,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利用率不高,如调查表明洗衣机成为米缸、空调闲置、淋浴污水随意排放污染环境等。

通过购买汽车、新修楼房体现的炫耀性消费);象征他们在家庭关系中的在场(如给予孩子和父母等代理消费);象征他们在乡村社会关系和仪式活动的在场(如人情消费和增进乡村福利的互惠性消费)等。这种种的象征在场深刻反映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危机,即留守老人的孤独、留守妇女的无助和留守儿童的孤寂,并进一步促进了乡村消费主义的蔓延和渗透,即以物品的符号意义替代生活的真实内涵和意义。

这种以物品的符号价值作为脱域性表达、体现和衡量人伦的重要媒介或手段的做法,恰恰在解构人伦,因为一切人伦都是立足于在地性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互动。以孝道为例,孝无非是“做子女的得在日常接触中去摸透父母的性格,然后去承他们的欢,做到自己的心安”^{[26]8}。然而,随着消费主义的渗透,孝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逐渐发生变化,不再基于“父母在,不远游”和安土重迁等伦理操守,并在一定程度上物质化,甚至以父母给子女留下了多少财产进行衡量。“在传统时代,代际关系并非如此,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并不是以父母给了子女多少财产来衡量的。对于父母来说,生养大于一切,是一切的来源。生养本身就意味着子女必须孝敬父母。而今天,老年人以给予子女的财产多少来衡量子女是否应当孝敬自己,这本身反映了老年人自身主体性的丧失。正是这种主体性的丧失,使得他们的自杀不是在激愤中死去的,而是在对子女的愧疚中死去的,愧疚自己没有能力给子女更多的遗产”^[34]。

这就引发了悖论:追求富裕,只能牺牲孝敬;留守孝敬,则只能忍受贫穷。也就是说以利他或伦理为名的富裕,在追求过程中模糊了实质上的伦理(亲情的陪伴)。物质化和人伦的两难凸显了乡村新贫困的内在冲突,即过多强调富裕的符号和金钱意义,导致对贫困理解的单向化和贫瘠化(反贫困是一个涉及能力培养和各种福利的可持续化过程,不是依靠单纯收入提高就能解决);一味脱去金钱纬度之贫困、追求物质化富裕的扶贫举措,其实又在制造新形式的贫困,即人际关系的疏离以及精神生态的危机。

(三) 集体消费提供“上移”和“下乡”的悖论

21世纪以来,中央逐步建立了支农专项补贴制度,增加农民收入;实行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保障农户收益;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大对农村科教文卫事业的投入,促进农村全面发展^{[35]127-129}。但随着城镇化的进行,村庄空心化,很多集体消费品被迫上移到城镇一级,使得村民在公共福利的享有上大打折扣。以教育和医疗为例,“城乡学校办学规模已呈现出‘城镇大班化、乡村空心化’的两级分化的态势”^[36]。面对这一情况,地方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往往优先满足城镇日益增多的中小学生学习需求,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向城镇学校倾斜,乡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每况愈下。越是偏远乡村,教育资源的配置就越差,教育不公平愈加明显,贫困的代际复制也愈发严重^[36-38]。同样,大部分的公费医疗医院集中于城镇,村民去医院看病非常不便^①。尽管国家尝试建立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以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但是“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尤其是村卫生室比较薄弱,逐渐发展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城乡协调发展、新农合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成为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长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重要因素”^[39]。

尽管早在1995年初就颁布实施《保护消费者权益法》,但是乡村居民的消费权益远未得到体

① 乡村医生是农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供给方,是推动新农合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力量。但现行新农合的制度设计过多地强调医疗费用控制,导致乡村医生的激励机制缺位,未能真正发挥医疗保险“守门人”的作用。县新农合管理中心规定乡村医生要先垫付农民在村卫生室门诊就医的费用,并采用规范化的复式处方登记、签字,然后在参合农民的家庭账户中标注所发生的医药费用,最后登记造表按月交到乡镇卫生院,待乡镇卫生院审核无误后领取所垫付的资金。这样,乡村医生的服务手续繁琐了,承担的资金风险增加了,但收益并未相应增加,严重影响了乡村医生的积极性。参见杜长宇:新农合对乡村医生的影响与乡村医生激励机制构建研究——基于河北省2市3个县的调查分析,载《兰州学刊》2010年第6期第104-108页。

现和保护。乡镇集市商品的价格与城市持平,可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充斥,无法保障村民的消费者主权。消费者主权的确立,意味着消费者的公民化。所谓消费者的公民化,指的是国家从制度层面来规定和保障消费者所享有的市场权利和社会权利:市场权利就是消费公民权,包括安全的权利、知情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与反映自己意见的权利;社会权利就是社会公民权,指的是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摄取与分享的权利,即集体消费的分享权利。“如果一个社会实现了消费者的公民化,那么,人们不但可以自由地选择,而且可以安全地消费”^[40]¹⁰⁸。由于与消费社会相适应的基础设施远未建立起来,乡村更遭受城市消耗力的剥夺。各种零售商的末梢触及到乡村,把不可持续的资源处理方式带到乡村。村民一切生活所需依靠市场,自然商品的包装,特别是轻便易携的塑料袋充斥着整个乡村,打破了乡村天然的循环,导致垃圾成堆,环境每况日下,难以可持续发展。总之,在集体消费上,“上移”和“下乡”的困境凸显新贫困的复制和代际传递,更显示了国家扶贫的困境和扶贫政策的盲点。如何打破新贫困复制链条和代际传递以及加强与消费社会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无疑将成为日后农村扶贫的重点。

三、应对:破解新贫困的迷雾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吸纳了发达国家的资本,成为“世界工厂”,为乡村过剩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劳动力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仍必不可少,不存在鲍曼所说的劳动力不再为社会发展所必需。然而,由于农民工要么从事非正规就业,要么在低成本的世界工厂就业,不论工资水平还是福利保障都远远不及城市居民。加之短时间内城市难以吸纳他们,乡村仍然是他们可退守的“后方”,发挥着稳定器和蓄水池作用。这意味着乡村集体消费的提供既关系到留守村民的切身利益和广大乡村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关系到农民工的福利。如果一味强调城市化,贬低和抹杀乡村的一切,企图在乡村推倒一切、重建城市生活方式,无疑是非常不切实际的。这就要求尊重乡村的价值,重估乡村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和福利体系,重塑乡村的社会支持和有尊严的生活。

(一) 反思消费社会

为了破解新贫困,我们有必要对消费社会本身进行反思。综观国内外学者对消费社会的定义,可以发现,消费社会主要指20世纪初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首先进入、发展中国家跟进的丰裕社会,典型表现为西方工业文明式社会^[41]。基于消费主义的运作逻辑,丰裕的消费社会具有以下特征:首先,高消费导致的高浪费。消费社会建立在时尚运作逻辑之上,一旦过时便迅速淘汰,由此导致对资源的极大浪费。扎卡里(Pascal Zachary)曾预警到,“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家……如果这种消费模式只是被中国模仿,对世界资源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42]。其次,制造虚假需要。人们消费的目的以物为指向,人在商品交换中成为物的占有者,失去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直接、感性的关联,即满足的不是真实需要,而是虚假或伪需要。最后,丧失了生活的真正内涵。为追逐符号性的地位,人们以高消费而不是和谐的人际关系作为衡量生活成功的主要标准,由此丧失了生活的内涵,导致精神生态的危机。

在批判与反思现有消费社会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特色的消费社会:第一,重新定义物质文明和富裕。丰裕社会主要以丰裕的物质文明为特征,但物质文明并不等于或导致物欲文明。物质文化可以客体化,体现或促进人性的完善、社会的发展和人与人乃至人与自然的和谐^[43]。富裕不仅仅是客观上的物品丰富,更是主观上的富裕感,如透明的社会关系和公平公正的社会体制。

第二,重新赋予消费以全新内涵。消费并不仅仅是通过对资源的消耗寻求快感的满足,其本身也具有生产性^[41],即通过消费促进人性的丰富、人际的和谐与社会的发展。山崎正精辟地指出,立基于效率主义,目前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消费社会追求以“消耗某种物品”为目的进行的“物质上的消费”,一旦欲望得到实现,满足感就会马上消失。然而,原本“人的消费活动恐怕就是和效率主

义相对立的一种行为,人们对其过程的关心程度要远大于实现目的本身”,因而“可以说,消费就是将物品的消耗和再生作为表面的目的,而实际上追求的是充实地度过时间”^{[44]140-141}。将消耗(consumption)转化为自我充实(consummatory),在三浦展看来,“这正是对第四消费社会(即简约型消费社会)的预言”^{[44]141}。

第三,在运作机制上,克服对物品符号意义的资本操纵,转变为对生活品质内涵的追求,即以和谐的人际关系、创新性的工作和休闲以及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作为核心价值 and 内在品质。“我们能够培养深层的、非物质的满足,这种满足是幸福的主要心理决定因素;它包括家庭和社会关系,有意义的工作以及闲暇”^{[45]102}。由此,“新”消费社会的内涵为:基于物品对人的主体性的丰富和创造性的提升,而不是外在符号象征意义的资本操纵,确立物品对人和社会的意义;以和谐的家庭和社区关系以及创造性休闲,而不是消费品量的拥有,确立生活的质量和社会的进步;以立基于环境保护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对自然无限开拓和征服的消费品的开发,确立社会进步的动力和人类发展的逻辑。

(二) 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并举

为了打破城乡二元格局,促进新贫困的有效解决,有必要实行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并举。新型城镇化不只是人口规模的城镇化,更是人口质量的城镇化,即落实在人口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上。这涉及“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即通过“四个融入”(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46]70}让农民工平等地享受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最终成为市民。新型城镇化既包括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智能化和信息化水平建设,切实提高城镇居民的公共福利水平,更涉及对城镇居民(特别是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仅仅这样还不够,正像弗洛姆指出,“舒适的物质生活、财富的平均分配以及稳定的民主与和平,都是西方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追求目标。然而,最靠近这一目标的那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精神病的征兆”^{[47]9}。这就要求克服消费社会中消费的异化,即“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是一种与我们真实自我异化的虚幻活动”;通过进行相应的社会改革,如改革不公平的资源分配体制、加大社会关系的透明度和民众的社会参与度、促进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建立“健全的社会”,其中“消费活动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富有人性和具有创造性的体验”^{[47]134}。

就新农村建设而言,在农民增收困难的情况下,任由市场刺激农民的消费欲望,只能增强农民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和自我边缘化,并强烈感到经济上的贫困。贺雪峰提倡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即鼓励“新三年旧三年”,反对铺张浪费,尤其反对以金钱来衡量人生价值的生活方式,建议一种让人们感到生活满意,崇尚一种有意义、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48]。中国快速的现代化一方面在破坏农民从村庄中获得的传统福利,一方面又不能为农民提供以高消费为基础的现代福利。他提倡从增加农民福利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是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从而减少农民的生产生活支出,降低农业风险,缓解农民支出的压力;二是通过农村文化建设,为农民提供非物质方面的福利。

贺雪峰以“低消费”鼓励“新三年旧三年”的消费观念似乎过于保守。新世纪以来国家开始具备一定财力反哺乡村,如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村民的消费水平,从2014年起贯彻实施以解决相对贫困为主旨,并最终达到小康水平的精准扶贫战略。基于此,在乡村实现“高福利+适度消费”的目标是切实可行的。为此,有必要采取以下举措:首先,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不可逆,唯有以产业化的农业与整个工业化的经济融为一体,才能最终使农民拥有与其它产业的人口大体相当的收入,能够消费社会主流产品。其次,健全乡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村民各方面的福利水平。最后,加强乡村的道德共同体或信仰共同体建设,真正把乡村建设成相互守望、相辅相携的“温情脉脉”的社区。实践证明,目前基于乡村规律、重塑乡村价值的美丽乡村建设的思路是比较成功的^[48-51]。

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并举的关键在于打破城乡区隔,通过城乡一体化促进城镇和乡村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城乡一体的城市中国,即整个国家城市和乡村基础设施是一体的,公共服务是均等的,整个国家被着上城市的底色,农民拥有与市民相当的知识、技能、素质和收入以及均等的公共服务,农村也拥有与城市相近的基础设施”^[52]。现在凡是能够结合城市优点(如现代制造、商贸物流、教育科技)和乡村优点,对乡村传统福利体系进行利用与改造,如保存传统文化、对自然风景和风俗人情开发的休闲旅游和美丽宜居的特色小镇建设都是比较成功的^[53-54]。

四、结论与讨论

消费社会中的新贫困不仅没有消弭旧贫困,反而由于新旧贫困的并存叠加深化了贫困,凸显目前国家进行精准扶贫的重大意义。新贫困的共同特点是富裕社会下由于福利失配导致的个体在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拥有上出现的贫困。这种结构性贫困在广告媒体激发的对合时宜或高尚的生活方式认同中,更加凸显文化性贫困。正如鲍曼指出,在富裕的消费社会中,尽管消费成了个体认同和社会归属的主要依据,但这是建立在人人具有消费购买力的预设前提上,一旦缺乏资源的穷人被资本主义劳动市场抛弃(不再是雇佣劳动后备军),甚至被资本主义国家抛弃(如社会公共福利的缩水),穷人不仅遭遇无法达到社会公认生活水准的贫困,还会遭受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等生存危机,经受被整个国家甚至社会抛弃的巨大风险,成为“被废弃的生命”^[12]。

鲍曼提出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消费社会或后工业化阶段面临的新穷人问题,即在生产过剩成为经济常态的情况下,如何确保穷人的生存权利。资本的全球流动使得穷人不再是雇佣劳动后备军,自然也失去自身价值和尊严的根基,因为在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中,劳动作为商品才能产生价值,被商品化才是尊严的前提。在生产者社会,“作为一个可能的生产者,他已经满足了加入生产者行列的所有条件。但承诺成为一个勤勤恳恳的消费者并要求成为消费者并不足以使人加入消费者的行列。消费者社会没有位置留给这些有缺陷、不完全的、无法履行义务的消费者”^{[12]7}。由此,穷人无论从生物学意义上还是社会文化意义上都被剥夺了生存的手段,成为“过剩的人”。“被宣布为是过剩的人表示你已经被当作废品处理,因为你是可以被处理的人,就像无法再次利用的空塑料瓶,一次性注射器,没人买的商品,或者因为不合标准或污染而被质量检查人员从生产线上丢弃的产品”^{[12]5}。对此,西方发达国家通常的做法是改变公共福利的供给,甚至改变福利国家的性质,“‘社会国家’是欧洲漫长的民主历史的登峰造极之作,也是直到日前为止的主导形态,但今天却处于衰败之中。社会国家的合法性,它对忠诚及服从的要求均有赖于它对其公民所做出的承诺。它承诺保护其公民,确保其不会成为多余的人,不会遭受排除和拒斥,同时不会像浮萍般被命运随意摆布——即承诺其公民不会因为个人的不足或是不幸,而被归为‘人类废弃物’;简单来讲,这种承诺就是在会被混乱的偶然性所主宰的生活中注入确定性和安全性”^{[12]93}。为此,导致围绕集体消费的供给而兴起城市社会运动^[7]。

在消费社会中潜伏着这样一种富足的“陷阱”:消费的民主化不仅未达致民主的推进和贫困的解决,反而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在导致财富的马太效应的同时,更有消费的马太效应和贫困的极度恶化,甚至对贫困者基本权利的剥夺,从而导致“废弃的生命”。反观作为“世界工厂”的我国,一方面存在劳动力短缺(主要为制造业),另一方面又由于产能过剩导致大量劳动力剩余,如“啃老族”和失业大学生等。汪晖将农民工群体和“蚁族”群体称为消费社会的两种新穷人,尽管他们有着迥异的诉求和作为,但都经受着因权利缺乏导致的贫困:前者遭遇来自城乡两方面剥夺与权利缺失,如就业、医疗及社会保障等市民社会权利的缺乏,并丧失乡村土地资源的继承;后者则遭遇交换

权利^①和住房权利的缺乏^[5]。或许由于研究旨趣的原因,汪晖没有关注另一类人数众多、影响深远的穷人即小农或农民群体。在全球生产过剩、劳动被削弱的时代,不仅“无数身强力壮的劳动力和经过正规教育的青年学生在强大的资本面前沦为了‘废弃的生命’”^[55],而且小农的劳动价值遭到贬斥,甚至农业和农村的价值遭到抛弃,因此,“我们需要再一次将农业视为一个主要雇主,认识到雇佣劳动力是农业活动的首要功能之一,这一功能仅次于生产优质食物和维护景观。然而,现代政策的设计却是特意要将农业劳动力一再削减,少到不能再少”^{[56]3}。

为了解决新贫困问题,除了从生产者角度提升穷人的能力、为穷人提供更多的资源以及确保穷人各项权利,从消费者角度提高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改变其生活方式,提倡健康、可持续的消费方式之外,还必须对导致生产过剩和劳动削弱背后的消费社会运作机制予以批判。流动的现时代建立在欲望的不断激发和瞬间满足,即“赌场文化”上,“每一件文化产品都被计算出最大影响(即为了粉碎、驱赶和处理昨日的文化产品)和瞬间退化(即缩短新物品和垃圾箱之间的距离,时刻小心不要因逗留太久而不受欢迎,要迅速腾出舞台以确保没有什么东西会阻碍明天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12]128}。因此“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必不可少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替代的。万事万物自诞生之日开始,就贴上了死亡即将来临的标签;每一样事物在离开生产线的时候,都被贴上一张‘在此日期前使用’的标签。……所有的事物,不管是天生的还是人工制造的,不管是人类还是非人类,都是有待进一步宣判的,是可有可无的。幽灵的阴影盘旋在流动性的现代社会的居民头上,笼罩着他们所有的劳动和创造,这是剩余的幽灵。流动的现时代是一个有着过度、剩余、废弃物以及废弃物处理的文明”^{[12]101-102}。

为此,有必要反思整个以物欲占有、消耗、过剩为特征的西方式消费社会,不再以财富、商品作为衡量生活水平的唯一标准。对生活水平的衡量,甚至社会的进步,不是财富、商品或者效用的评估就能达成,归根结底在于个人的功能性活动和能力的评估。“我在其它场合把我们能够或者不能实现的各种不同生活条件称为‘我们的功能性活动’,而把我们完成功能性活动的能耐称为‘能力’。这里的要点是生活水平确实是一个功能性活动和能力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直接的财富、商品或者效用问题”^{[57]22}。“能力从积极的意义上看是一个有关自由的概念,即你在自己可能过上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实际机会”^{[57]48}。也就是说,对贫困的最终解决必须落实到有助于贫困者能力和自由提升这一生活伦理上来。这与弗洛姆提倡的理性主体的培育、马克思向往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妙^②。

如何从生活伦理高度,通过生产者和消费者培育两方面贯彻落实精准扶贫,即如何在精准扶贫识别阶段注重和预防高消费导致的贫困(结婚彩礼和购买城市住房等高消费),在精准管理阶段重视开发和利用乡村的福利资源,在集体消费品供应上打破教育上的贫困代际复制和因病致贫的恶性循环,并确保消费公民权和社会公民权的实现,从而最终确立可持续性反贫的战略目标,这些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如何通过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并举的方式解决新贫困问题,建构中国式消费社会或“生活型社会”^[58],也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① 阿马蒂亚·森探讨的交换权利,即“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可以将自己所拥有的商品转换成为另一组商品。这种转换可以通过贸易、生产或两者的结合来实现。在转换中,他能够获得的各种商品组合所构成的集合,可以称为这个人所拥有的‘交换权利’”。参见阿马蒂亚·森《生活水平》沈国华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② 基于康德对理性概念的界定,即我们之所以值得尊重,是因为我们是能够根据理性原则指导自身生活的理性主体,弗洛姆认为所有文化的伟大思想都立足于对人性的理性认识,对人全面发展的条件的认识。“文明的不健全状态更多在于自由精神和自信心的衰退,而不是许多人的物质贫困问题”,参见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89页。阿马蒂亚·森特意提及,马克思特别强调自由在评判一个人生活时的重要性,如对未来自由社会的设想中,可以自由从事各种职业,以促进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参见阿马蒂亚·森《生活水平》沈国华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参考文献]

- [1] 鲍曼. 工作、消费与新穷人. 王志弘译. 台北: 巨流有限公司, 2002
- [2] Phyllis Day. The New Poor in American: Isolationism in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ocial Work*, 1989(3): 227 - 233
- [3] Nathan Keyfitz.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Society*, 1992(2): 42 - 47
- [4] Leo Goodstadt. *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ffluence: How Hong Kong Mismanaged its Prosperi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 [5] 汪晖. 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 开放时代, 2014(6): 49 - 70
- [6] Theodor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 [7] Manuel Castells. *City, Class and Power*. London: Macmillan, 1978
- [8] Peter Saunders.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cation, 1986
- [9] 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 蔡受百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10] 波德里亚. 消费社会. 刘成富, 全志钢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11] Colin Campbell. *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r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 [12] 鲍曼. 废弃的生命. 谷蕾, 胡欣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 [13] 贝尔. 环境社会学的邀请. 昌敦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14] 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 [15] Claude Levi-Strauss. *Totemism*. Harmondsworth: Pelican Books, 1969
- [16] Ferdinand Saussure. *Mythologies*. London: Jonathan Cape Ltd, 1972
- [17] 布尔迪厄. 区分: 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刘晖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18] Robert Bocoock. 消费. 张君玖, 黄鹏仁译. 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 1995
- [19] Juliet B. Schor. *The Overspent American: Upscaling, Downshifting, and the New Consumer*.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 [20] 吴惠. 消费主义视野下农村居民的消费心理变迁: 以江苏省P村为例. 华东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3
- [21] 曹晖. 防止消费主义文化对农民的剥夺——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访谈录. 中国老区建设, 2009(4): 25 - 26
- [22] Patrik Jonsson. The new poor and the almost-poor: Will poverty rate climb mor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010-9-16
- [23] 王宁. 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 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24] 郑国庆. “生活”, 看到的, 与没看到的. 读书, 2002(11): 28 - 35
- [25] 顾昕. 贫困度量的国际探索与中国贫困线的确定. 天津社会科学, 2011(1): 56 - 62
- [26] 费孝通. 乡土中国·乡土重建.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6
- [27] 张敦福. 乡土中国的消费文化——费孝通早期著作考察.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4): 55 - 61
- [28] 格罗瑙. 趣味社会学. 向建华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29] 徐京波. 从集市透视农村消费空间变迁: 以胶东P市为例. 民俗研究, 2013(6): 142 - 149
- [30] 尼古·埃尔潘. 消费社会学. 孙沛东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31] 李洪君. 当代乡村消费文化及其变革: 一个东北村庄的物质、规范与表达.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4
- [32] 黎相宜, 周敏. 跨国空间下消费的社会价值兑现——基于美国福州移民两栖消费的个案研究. 社会学研究, 2014(2): 43 - 64
- [33] 江立华, 卢飞. 农民工返乡消费与乡村社会关系再嵌入. 学术研究, 2015(3): 40 - 46
- [34] 陈柏峰. 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 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 社会学研究, 2009(4): 157 - 176
- [35] 应星. 农户·集体与国家——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六十年变迁.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36] 范先佐. 乡村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5): 146 - 154
- [37] 姚荣. 从“嵌入”到“悬浮”: 国家与社会视角下我国乡村教育变迁研究.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4(4): 27 - 39
- [38] 蔡志良, 孔令新. 撤点并校运动背景下乡村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4(2): 114 - 119

- [39] 杜长宇. 新农合对乡村医生的影响与乡村医生激励机制构建研究——基于河北省2市3个县的调查分析. 兰州学刊 2010(6): 104-108
- [40] 王宁. 家庭消费行为的制度嵌入性.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 [41] 郑红娥. 消费发展观——社会发展的新范式. 学术界 2006(2): 78-88
- [42] Pascal Zachary. The World Gets in Touch with Its Inner America. *Mother Jones* ,1999(1): 50-57
- [43] 米勒. 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 费文明 朱晓宁 译.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0
- [44] 三浦展. 第4消费时代. 马奈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 [45] 杜宁 艾伦. 多少算够: 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 刘晓君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 [46] 迟福林. 转型闯关——“十三五”: 结构性改革历史挑战.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6
- [47] 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 欧阳谦 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
- [48] 贺雪峰. 立足增加农民福利的新农村建设. 学习与实践 2006(2): 84-89
- [49] 翁鸣.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和创新的典范——“湖州·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湖州模式)研讨会”综述. 中国农村经济 2011(2): 93-96
- [50] 吴理财 吴孔凡. 美丽乡村建设四种模式及比较——基于安吉、永嘉、高淳、江宁四地的调查.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 15-22
- [51] 王卫星. 美丽乡村建设: 现状与对策.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 1-6
- [52] 倪鹏飞. 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模式、具体路径与推进对策. 江海学刊 2013(1): 87-94
- [53] 苏斯彬 张旭亮. 浙江特色小镇在新型城镇化中的实践模式探析. 宏观经济管理 2016(10): 73-75
- [54] 徐剑锋. 特色小镇要聚集“创新”功能. 浙江社会科学 2016(3): 42-43
- [55] 范德普勒格. 新小农阶级: 世界农业的趋势与模式. 潘璐 叶敬忠 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 [56] Colin Tudge. *So Shall We Reap: What's Gone Wrong with the World's Food and How to Fix I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4
- [57] 阿马蒂亚·森. 生活水平. 沈国华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
- [58] 王雅林. “生活型社会”的构建——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西方“消费社会”的发展模式.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1): 5-14

Disturbance and Reconstruction Route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under New Poverty

Zheng Honge Tong Xing

Abstract One of the important backgrounds of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s the arrival of a global consumer society. This makes the new poor phenomeno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it has become a core feature of the whol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s a typical manifestation of the new poor in China, the new poverty in rural areas not only shows that it is difficult for villagers to obtain socially accepted standards of living which takes urban life as the reference base in the urban and rural dual dichotomy, but also embodies social psychological poverty caused by consumer desire. As a result, the rural consumption transform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many difficulties. On the side of private consumption, recognition of individual consumption is facing the dilemma of the localized and disembedded relations, while the family consumption norms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dilemma of materialism and moral relations. On the side of public consumption,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is up against the dilemma of moving up and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se dilemmas, it is imperative to break the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dilemma of "new poverty" from the consumption point of view and implement new urbanization and new rural construction simultaneously.

Keywords Consumption transformation; New poverty; The new poor; Collective consumption; Private consumption